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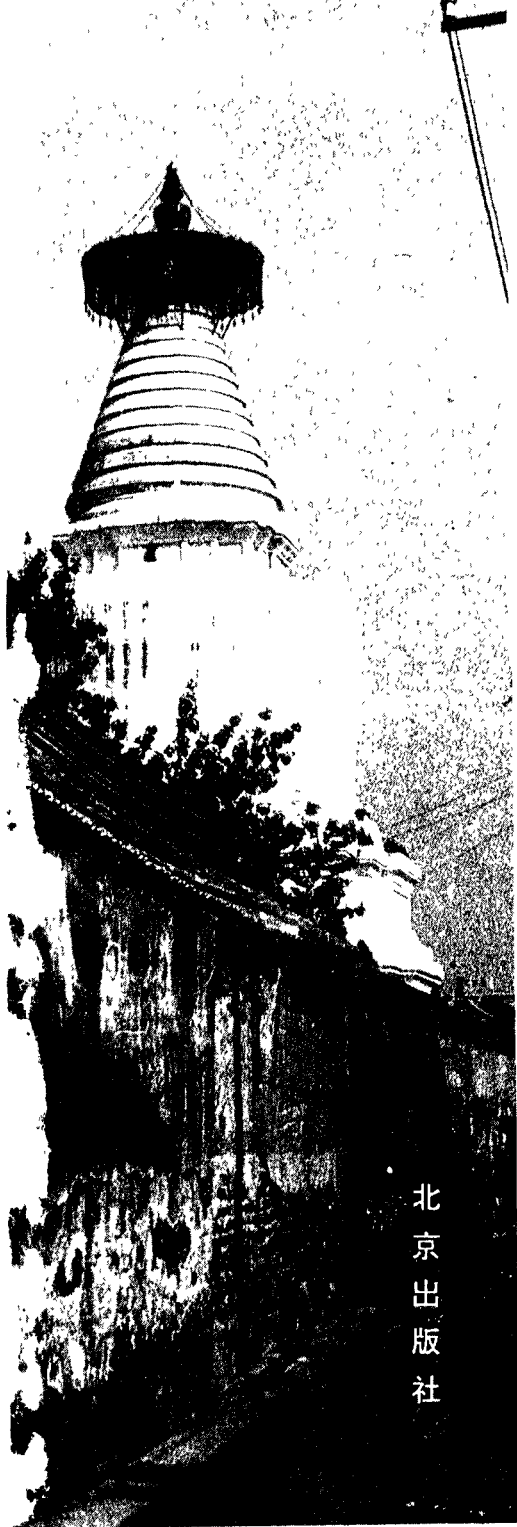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京文史资料

甲石题



北京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北京文史资料
BEIJING WENSHI ZILIAO
第五十辑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朝阳区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 375 印张 163000 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 200-02458 9/K · 249

定 价 6 70 元



1994年1月8日李平凡先生为读者作画(任志 摄)



1947年10月鲁迅逝世十一周年,日本左翼木刻家举行“全日本新木刻运动大会”
图为大会前夕内山嘉吉报告1931年鲁迅举办上海木刻讲习会的历史性意义
(平凡 摄)



1987年日本艺术界在中国大使馆向李平凡授予
日中版画友好交流特别贡献金杯奖(新华社 摄)



饥民 (1939年 17岁)



拾垃圾 (1940年 18岁)



农妇（1941年 19岁）



流浪儿（1940年 18岁）

中国解放区木刻

郑雅·李平凡編 / 小野田耕三郎訳・解説

未来社刊



1972 年日本出版《中国解放区木刻》日译本。此书当时被“四人帮”宣布为“黑书”。



《平凡木刻版画》第一辑,封面木刻 李平凡先生设计的藏书票(1990 年)
题名为《平凡在黑暗中》(1942 年 20 岁)

(以上图片见《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工作回忆录》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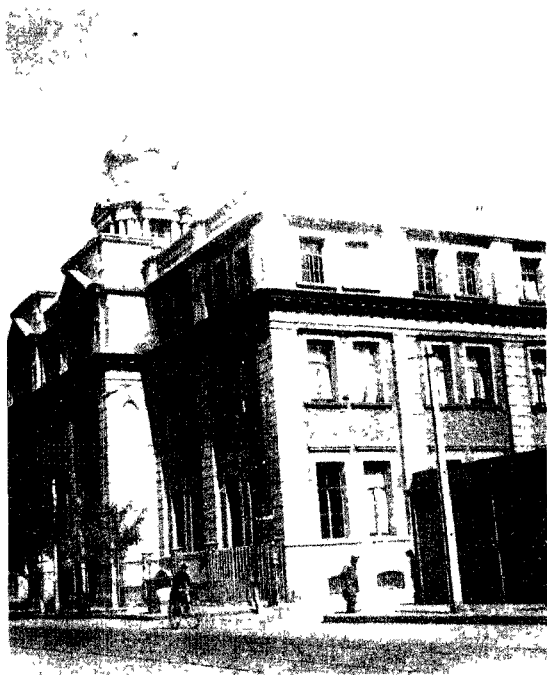


1965年7月20日,周恩来总理到机场
迎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

(见《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一文)



设在东交民巷台基厂海关附近一座庙内的北京邮局(1897 年)
(刘小东 绘)



建在户部街的北京邮政
管理局大楼(1922 年)

(以上图片见《回顾中国近代邮政》一文 赵乃基 供稿)



貝滿女中校門



貝滿女中校園一角



贝满女中学生宿舍

(以上图片见《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女中》一文 均由蒋雯 供稿)



北京大中中学校址

(爱新觉罗·溥筠 提供)

(见《七秩扬芬话大中》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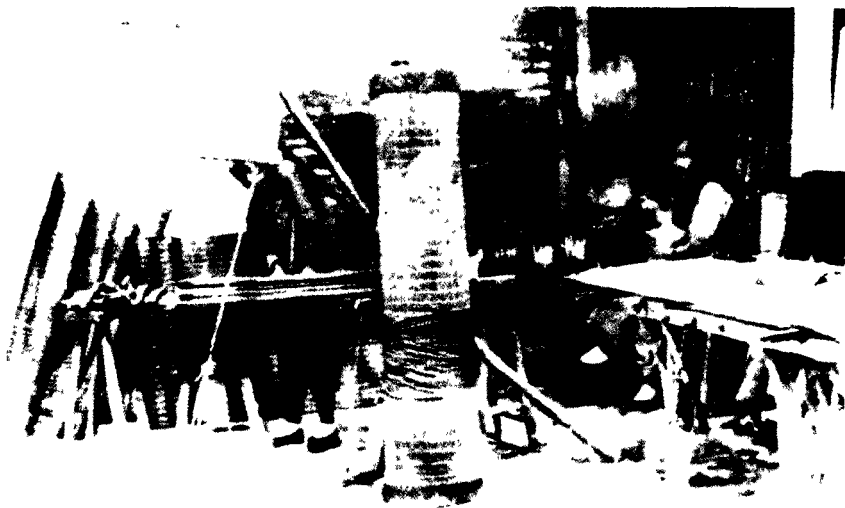
耍猴戏



拴笼屉工匠



街头剃头匠



打帘子工匠

(以上图片见《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一)》一文 均由翟鸿起 供稿)

北京文史资料

第 50 辑

· 艺术家自传 ·

1 版画沧桑——李平凡版画工作回忆录

李平凡

· 人物春秋 ·

90 李宗仁归国后生活拾零

尹冰彦 遗稿

· 邮政史话 ·

121 回顾中国近代邮政

赵乃基

128 旧中国邮政的人事管理制度

赵乃基

· 京城名校 ·

139 一所教会学校——贝满女中

李爽麟 蒋雯

159 七秩扬芬话大中

爱新觉罗·溥筠

· 居京琐忆 ·

170 老北京的街头巷尾(一)

翟鸿起

北京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西小院

邮编:100031

电话:6055813 6050524

本期发稿编辑:张秋萍 杨维新

版画沧桑

——李平凡版画工作回忆录

· 李平凡 ·

一、我的故乡

1922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我和妹妹双胞胎出生于天津市津南区高庄村。这个村庄，曾被国民党政府命名为“模范村”。

所谓模范村，主要是村容村貌的外表较好，村里街道铺有炉灰渣，村外有农场、林场和造纸厂，还有一所远近闻名的小学堂。这一切，都和我的旧家——封建大家族“忠厚堂”有关。

早在晚清时，我的祖辈受新学影响，在高庄创立了天津第一所“李氏私立小学堂”，袁世凯送过“师资永赖”的大匾挂在学堂大门里的正中央，后来大总统徐世昌也送过，因而这所小学堂在当时闹得很有点知名度。我家又在村外大片盐碱地开垦水田数千亩，建成“李氏农场”，聘农业技师以科学方法种植日本米种“金钢稻”，米质优良、高产，在城里兴办“李氏利农公司”搞新米专利（后来这种米在天津郊区普及成为名产“小站米”）。六七十年前，我家又受振兴民族工业影响，建立“李氏造

纸厂”，但无法与进口纸竞争，最终以倒闭告终。

“忠厚堂”这个封建世家，号称五世同堂，全族人口近百人。从我幼年能记事起，家族内部争产夺权，一直打官司闹家产，愈演愈烈，家境日渐衰落。到了抗战八年间，开始大分化，有的与日帝、日伪相勾结，堕落成为汉奸走狗，另有不少青年受“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影响，弃家离乡，参加了我们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二、周恩来数次来我家

在我背叛“忠厚堂”离家出走之前，曾听伯父和父亲都说过一件当时不能外传的家庭私话：周恩来数次来我家。

周恩来是我二伯父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同校生，是我七叔的同班同学。我大伯父也是周恩来英文教师崔伯（入中国籍的美国人）的朋友。由于这些关系，他们一度交往较密，一起拍过照片，周恩来也曾数次到我家小住。后来我二伯父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传说周恩来也到过日本的同一学校。我听伯父说过：周恩来与一般青年不同，头脑敏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人谦虚和蔼，对事深思熟虑，特别关心当时新文化运动。有一次，周恩来住我家客厅，埋头写完一部新剧本《一元钱》。这些话，至今记忆犹新，在我头脑中一直把这件事作为我出身之家最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佳话。

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周恩来读书的天津南开学校，和我家私立的李氏小学堂，都用了同一张在天津城里设计的房图。因而周恩来第一次与我七叔到高庄时，感到惊喜异常，说过“我想不到了高庄子的南开了”。

我从日本回国定居后，有幸和周总理有过两次接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1950年7月，我刚回国不久经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在北京中山公园举办了《日本人民反帝斗争图片木刻展》，是为纪念日本共产党建党28周年。有一天总理突然到会场来参观，我

第一次听到总理带天津口音的说话声。总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日本搞什么工作，多大年岁……总理的出现，大出意料，突然见面，心情特别紧张，不知为何我竟把28岁的年龄顺嘴说成82岁。总理一愣，随后仰头哈哈大笑，而后以鼓励的口吻说：“不要紧张么，小李，你很年轻，这个展览会听说办的很好，我才来了，今后要好好工作……”想不到总理那么亲切的音容笑貌和平易近人的风范，一下子扫走了我的紧张心情。

几年之后，埃及一个美术展览会在北京展出，总理也应邀出席了开幕活动。在大厅休息片刻时，我凑近总理说：“我想请教您一件事。”总理望着我忽然说：“我看你面熟，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我告诉他在中山公园的日本展览会上。总理“啊”了一声说：“想起来了，小李，你是小李李平凡！”我感到总理有惊人的记忆力。接着我说我是天津高庄李家的后代，七叔李象椽是您的南开同学，我的伯父也和您相熟……”总理很有感慨地说：“记得，我全记得，时间太快了……”在说话中我告诉总理他的英文老师崔伯，抗战八年中在天津闭门不出，直到日帝投降才出来和老朋友们共庆抗战胜利。总理听着点点头说：“这是一位入中国籍而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三、第一次画画挨打

在我幼年生活中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画画就挨了打。由于这次的深刻记忆，我一生最深恶痛绝的事，那就是看见大人打孩子，或是大孩子打小孩子。我对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虽也斥责过他们的过失，但从没打过他们一下，原因即在此。

我幼年生活的高庄，是距天津海河较近的村子。我时常跟随父亲和哥哥们到河边玩耍。芦苇塘里的鸟鸣，嬉闹的小鸟群，草丛里各种小昆虫，河里打鱼的小渔船，还有喷着烟往来的轮船，以及船尾卷起的浪花……这些都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充满着诱人的喜悦和魅力。